

虔诚者路易的虔诚

——学术史的考察

李隆国

【摘要】虔诚者路易的绰号为虔诚者,理应受到教会史家的大力褒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中古史家对他的兴趣并不大。17世纪天主教会史家对他重新重视起来,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中古史学从教俗分离视角下对他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史料、政治制度和基督教政治文化等方面,虔诚者路易得到了重估和更加积极的评价,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似乎也变得名副其实,成了基督教理想政治的尝试者。

【关键词】虔诚者路易;虔诚;基督教政治话语;仁慈与正义

【作者简介】李隆国(1971-),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古代文明》(长春),2024.10.50~58

874年2月,年事已高的东法兰克(East Frankish)王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 约804-876)来到法兰克福(Franfurt),进行例行的宗教祈祷活动。一天夜晚,他梦到了自己的父亲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781-840年在位)。父亲正在进入天堂的窄门中经受着磨难,因此请求儿子帮他解脱磨难,以便获得永生。日耳曼路易随后给王国所属修道院发函,请求帮助。记录此事的史家评论说:“已故皇帝尽管做了许多为神所赞许的事情,但也曾允许不少违背神法的事情发生。”^①在虔诚者路易去世30多年后,他的儿子仍在质疑父亲的虔诚之德,虔诚者路易的名声将为此受到严重挑战。本文拟梳理虔诚者路易的评价史。文章首先介绍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及其身后名声,然后重点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重估虔诚者路易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结尾部分将会对重估再进行重估,庶几鉴往知来矣!

一、虔诚者路易的虔诚

虔诚者路易于778年出生,781年年仅四岁的时候,在罗马(Rome)被罗马教宗哈德良一世(Hadrian I, 772-795年在位)施洗并膏立为阿奎丹(Aquitaine)王。806年,查理曼颁布分国诏书,将帝国一分为三,帝国将由儿子小查理(Charles the Younger, 792-811年在

位)、意大利王丕平(Pippin of Italy, 781-810年在位)和虔诚者路易分别继承。810年和811年,虔诚者路易的两位亲兄长——意大利的丕平和小查理先后去世。813年,查理曼立孙子伯纳德(Bernhard)即意大利王丕平之子为意大利王(813-818年在位)、虔诚者路易为共治皇帝。虔诚者路易“由于天命攸归”由领土份额最小的诸侯王成为加洛林帝国的皇帝。

入主亚琛之后,虔诚者路易开展修道院改革,颁布《帝国御秩》(Ordinatio imperii),立自己与伊尔明嘉德(Irmingard of Hesbaye, 约780-818)皇后所生的大儿子罗退尔(Lothar I, 814-855年在位)为共治皇帝,处死意大利王伯纳德。823年,新皇后朱迪丝(Judith, 约800-843)生下了漂亮的儿子,即后来的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 829-877年在位)。829年由于意大利(Italy)和西班牙(Spain)边境危机,虔诚者路易处置失当,引发家庭内部不和与贵族叛乱。833年6月,罗退尔带着教宗格里高利四世(Gregory IV, 827-844年在位)、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和阿奎丹的丕平(Pippin of Aquitaine),率大军在阿尔萨斯(Alsace)集会。虔诚者路易被迫退位,承诺在修道院终老。次年,虔诚者路易恢复帝权,罗退尔败退意大利。直

到838年罗退尔最终与父亲和解。839年,虔诚者路易南征阿奎丹。840年日耳曼路易攻占阿拉曼尼亚(Alemania),虔诚者路易率军征讨,因为肺病6月死于英格尔汉姆(Ingelheim)。据841年左右完成的《路易皇帝传》(*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s*),临终前虔诚者路易虽然原谅了日耳曼路易,但派人捎话过去,强调日耳曼路易给他带来了伤害。^②

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可以划分为如下阶段:教会改革和继承安排时期(814-818),续弦与王国治理改革时期(819-828),家族内部纷争时期(829-840)。第二个时期,是公认的统治盛期乃至加洛林帝国的最高峰,而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则是非糅杂、存在争议。正是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前后两个时期,导致其名声大起大落。从最小的国王到统御广袤加洛林帝国的皇帝,虔诚者路易自以为天意攸归,乃领导教会改革,建设基督教理想社会。又因为边疆问题和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引发内战,虔诚者路易被迫退位,命运多舛。虔诚者路易的教会改革与家庭纠纷左右着其声名的升降。

虔诚者这一绰号授予的对象往往是那些爱护教会,赐予教会利益,并得到教会褒奖的中世纪王侯贵族。20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希费尔(Rudolf Schiffer)专门撰文说明,虔诚者路易生前很有可能并没有得到虔诚者的美称。^③但他的研究表明,虔诚者这个形容词,是历代尤其是王朝后期加洛林君王非常喜爱使用的绰号。不仅如此,近年来有关虔诚者路易的接受史,也颇受关注。尼古拉斯·施陶巴赫(Nikolaus Staubach)总结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古代日耳曼历史研究中虔诚者路易的形象。^④2004年德国学者海克·尼尔森-闵恩贝格(Heike Nelson Minkenberg)的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地梳理了9—13世纪历史叙事中虔诚者路易的形象。他认为,在9世纪,这一形象始终很正面。在加洛林后期,史家一方面将虔诚者路易与父亲相提并论,视为黄金时代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认为其开启了罪恶的时代。11世纪的叙职权之争使虔诚者路易的形象暗淡无光。^⑤20世纪80年代,托马斯·诺贝尔也曾从重估虔诚者路易的视角,梳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学术研究动态。^⑥下面将围绕“虔诚”问题,简要

地梳理“二战”前不同历史时期对虔诚者路易的重新评价。

在虔诚者路易死后不久,他所偏爱的儿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 829-877年在位)非常努力地褒奖乃父的虔诚。在853年颁布的敕令中,秃头查理重申乃祖乃父的政策:“依据教规权威和我的祖父查理皇帝陛下和我的父亲虔诚的路易陛下的敕令要保持原貌。”^⑦但是,这里的“虔诚”还是作为形容词修饰一个人名。恰恰是在东法兰克王国,9世纪末的文献中出现了这一绰号。结巴诺特克(Notker the Stammered, 约840-912)在其所撰《查理大帝传》(*Gesta Karoli Magni*)中,称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 876-887年在位)的祖父是绰号为虔诚者的路易,此即虔诚者路易。“您最诚笃的被称作‘虔诚者’的祖父路易”。^⑧此传记创作于883-887年间。

虔诚者路易生前有两部作品分别歌颂其德操和统治。一部为826年前后,诗人赫尔穆德(Ermoldus Nigellus)写作的《皇帝路易颂》(*In honorem Hludowici imperatoris*),以描绘王宫图画的方式,热情地歌颂了加洛林先公先王以及虔诚者路易。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不久(835年左右),特里尔副主教瑟甘(Thegan of Trier, ? -约850)写作了《路易皇帝传》(*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为虔诚者路易、皇后朱迪丝以及秃头查理辩护,责怪皇帝的耳朵根子太软,听信了忘恩小人的建议。在虔诚者路易刚去世的时候,匿名作者(被称为无名星官或者天文学家)撰写了《皇帝路易传》。^⑨作者歌颂了已故皇帝的德操,唯独过于仁慈算是其唯一的缺陷。

尽管瑟甘是特里尔副主教,然而10世纪初,避难特里尔的普吕姆(Prüm)修道院院长赫基诺(Regino of Prüm, ? -约915)写作其历史名著《编年史》时竟然说:“事实上涉及路易皇帝的时代,我能找到的文献很少,既不能从记载中得知,也不能从记忆力良好的老人那里得到传闻。”^⑩赫基诺似乎忽略了虔诚者路易统治前期和中期锐意改革所留下的丰富文献,只留下了有关虔诚者路易一生的一鳞半爪。有史家认为,在中世纪史料匮乏、图书流传范围有限的前提下,赫基诺的忽略似乎情有可原。^⑪然而,作为教会法学家,赫基诺对皇后朱迪丝通奸引发虔诚者路易

被废一事深信不疑,可能导致他不愿意叙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不论其动机如何,他的这种态度,在中世纪影响深远。

不仅如此,到11世纪,虔诚者路易的另一项巨大功绩:教会改革,也遭到了罗马教会的直接批评。11世纪是罗马教宗领导教会改革的重要时期。1059年5月1日由教宗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 1059-1061年在位)在罗马主持召集会议。讨论俗人不得任命教职的问题,专门检讨了虔诚者路易于816-817年颁布的《教士指南》(*institutio canonicorum*):“尽管路易是皇帝而且虔诚,但是为平信徒。他不能合理地改变王国教省内违背教规的问题,也没有得到神圣的罗马使徒教座的权威和同意。”^⑫主教代表大会的这一决议使得时人进一步忽略虔诚者路易取得的功业。在史学名著《双城史》(*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中,12世纪的大史学家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对虔诚者路易的记叙就很简单,没有提到这位皇帝领导的教会改革。在极为简洁地说明了继位、加冕、平定伯纳德叛乱、立罗退尔为共治皇帝等事件之后,他说:“据说路易皇帝由于妻子所做的恶而被废黜、后来又复位,在其统治的第26年去世。”^⑬回应了两个世纪前赫基诺的处理方式。

然而,如前所言,在西法兰克王国(大体相当于今法国),中世纪史书中关于虔诚者路易的叙事要丰富得多。圣德尼(St. Deni)修道院编写的《法兰西大编年史》(*Les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站在虔诚者路易的立场,依靠加洛林时期撰写的《法兰克王家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圣伯丁年代记》(*Annales Bertiniani*)等史书,大体按年分为24章,详细叙述了虔诚者路易的事迹,为皇后朱迪丝辩护,“据此理所当然地她合法地洗脱了自己”。^⑭背叛父亲的儿子们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谴责。在现代教会史初创之时,这一史学传统得到了合理的继承。

17世纪末现代教会史学之父巴洛尼乌斯(Caesar Baronius)编写皇皇巨著《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以教会史事为中心,尤其围绕罗马教宗的言行,辅之以虔诚的君王之事功,对中古基督教会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作为加洛林教会改革的核心人物,虔诚者路易的事迹也得到了非常详细的论

述。分别依据《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瑟甘的《路易皇帝传》、无名星官的《皇帝路易传》《埃蒙的史记》(*Historiam Aimoni*)以及其他教会史资料,巴洛尼乌斯对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逐年进行了描述。虔诚者路易召集的各次宗教会议,法兰克地区从罗马所请的各种圣徒遗骨迁徙故事,都一一胪列。在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历次针对虔诚者路易的谋逆之后,巴洛尼乌斯间接地批评了叛乱的儿子们。他对虔诚者路易的总评就是无比的虔诚。^⑮

与天主教会的权威历史叙事不同,启蒙史学家们将刚刚受到重估好评的虔诚者路易又重新拉下了神坛。他们不再以基督教的虔诚作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恰恰相反,从教俗分离的角度,他们认为教士干政是一切罪过之源。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不仅意味着人格软弱而且还导致政治失败。伏尔泰(Voltaire)在《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中说,“路易被人称为‘温厚者’,因为他软弱;正因为软弱,所以为人残忍……他既没有他父亲的勇敢精神,也没有这种勇敢所带来的权威,于是便受到忘恩负义的报应。作为叔父,他非常野蛮;作为兄弟,他过于冷酷;而作为父亲,他又过分的温良”。“虔诚者路易的不幸,以及此后荼毒欧洲的那许多更为严重的祸害,其一个根源就在于给出世之人以治世之权,这种弊端当时已开始出现。”“虔诚者路易的软弱,他的儿子们的忘恩负义,教士们的贪欲”不仅带来了内战,而且使得帝国“匆匆建立,也匆匆崩溃,内部战争使之四分五裂”。^⑯

尽管孟德斯鸠对虔诚者路易的人品怀有同情,但是对他的性格缺陷颇有微词:“不仅受到自己的情感的玩弄,甚至受到自己的品德的欺骗和迷惑;他对自己的力量从来都不理解,对自己的软弱也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如何让人们畏惧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让人们爱戴自己;虽然他心里的邪恶很少,但精神上的缺点却不胜枚举。”“他的家庭被他搅得一团糟,十分混乱,他的君主国也因此而走向了灭亡。”孟德斯鸠认为虔诚者路易并没有充分争取教会和世俗贵族中任何一方的支持,由于他“挥霍掉了王室的产业”使帝国衰落。^⑰

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

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叙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建立起经典性二分式现代历史叙事。大致以819年续弦为界,此前的虔诚者路易名副其实,不断地主持公道,恢复政治秩序,“到这个时候,必须承认,路易的统治,强大而正义,维持了帝国的统一,拓展了其影响力。蛮族畏惧他的武力,敬佩他的神圣性。”由于受到妻子的蛊惑,此后性情大变,出圣入凡,软弱起来,做了公开的忏悔,尽管这是欧洲伦理史上的大事,标志着自我意识由此觉醒,但是其后果堪忧。臣民们认为,他不配领导军队,帝国不仅为此蒙羞,而且由于贵族和主教期盼自立,遂开始走上瓦解的必然之路。皇帝再也无法扭转多元部族分立的格局。虔诚者路易成为一位悲剧英雄。^⑧

米什莱从性格转变的角度来解释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剧变,并以819年为界说明其统治的前后不同。此后权威性历史作品则将伦理与国务适当分开,从分国制度的视角来分析虔诚者路易统治的转变以及加洛林帝国的解体。在《剑桥中古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三卷中,法国史家普帕尔丹(René Poupardin)认为822年举行的阿提涅(Attigne)公开忏悔,不仅使教会势力尘嚣而上,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这一年,虔诚者路易在王国大会上举行公开忏悔仪式,为自己过于残酷地对待侄子——意大利王伯纳德(819年被判处叛国罪,在刺瞎双眼时身亡)以及为父亲的过失而请求得到宽恕。虽然普帕尔丹承认虔诚者路易的再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与朱迪丝成亲,使虔诚者路易受到皇后的深刻影响;但是他更重视帝国分割所造成的影响,认为823年秃头查理的降生使“虔诚者路易此后的统治几乎完全局限于3个方面:在朱迪丝的影响下努力为幼子争取一份遗产;3个儿子所采取的反制措施;以及罗退尔一党拼命维护统一原则”。^⑨

在现代政教分离大势之下,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存在着教会改革与政治措施的两分视角。受此影响,其统治时期被一分为二。前一时期为厉行教会改革时期,他的功业得到了适当的肯定;后一时期则因为发生内乱而备受批评。政教分离的视角,使得个人虔诚不如政治治理那么引人注目,虔诚者路易

的形象总体上较为负面。虔诚者这一绰号或多或少被视为一种政治能力缺陷,他是继承伟大父亲(查理曼)的不肖子;其统治标志着加洛林王朝由盛入衰、从统一走向分裂。^⑩

二、政治制度、文本和政治话语:重估虔诚者路易

“二战”后,比利时历史学家冈绍夫(François Ganshof)在教学中系统梳理加洛林王朝盛衰史的时候发现加洛林帝国的衰落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节奏彼此并不一致,虔诚者路易的统治标志着加洛林帝国的分裂和衰亡、与其代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鼎盛期之间存在矛盾性结合。有鉴于此,他从制度史的角度重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前期,为虔诚者路易翻案。尽管同样是将虔诚者路易的统治时期一分为二,但冈绍夫雄辩地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证明,828年之前的时期称得上是加洛林王朝的辉煌时期。虔诚者路易从王国大会制度化、强化宫廷制度、推广巡察钦差制度、法令规范化等方面巩固了帝国一体观念;但在其统治后期,由于自己的疏忽,虔诚者路易使一切都颠倒过来。^⑪通过将关注点从政治事件转向政治制度,冈绍夫不仅成功地把虔诚者路易统治分期的节点向后从819年移至828年,而且开启了重估虔诚者路易的学术潮流。

1980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诺贝尔(Thomas Noble)全面总结了冈绍夫之后30年的相关再评价进展,从教俗关系的角度批驳了学术界对虔诚者路易的批判。诺贝尔不仅认为虔诚者路易所进行的教会改革重要且具有原创性,而且还分别从教会地产的豁免权、罗马教宗与加洛林君主的关系、自由选举主教、822年的阿提涅公开忏悔等话题从有利于皇帝控制的角度做了积极的评估。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也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富有)修道理想且有益于促进政治和制度改革。”诺贝尔呼吁,“要把虔诚者路易当作他自己而非查理曼的儿子”来研究。他推测,虔诚者路易并非没有能力处理与儿子们的冲突,而是没有相应的条件。^⑫从教会政治史尤其是教权与帝权关系的角度,诺贝尔重估了虔诚者路易的虔诚。

在这种重估风气的推动下,1986年国际学术界在牛津大学召开大会,兑现了从虔诚者路易的角度

来研究其时代的承诺。会议论文集收入了31篇文章,厚达700余页。其中珍妮特·尼尔森(Janet Nelson)续接冈绍夫的重估,从政治制度建设的角度重估了虔诚者路易的晚年,否定了将其统治时期前后二分的做法。她认为在830-834年的叛乱之后,虔诚者路易很快就实现了家庭和解;他不仅重新有效地控制了教俗高级官职的管理,而且通过更加富有技巧和特色文化的方式巩固了边防;通过开会和狩猎活动重建政治共识;从制度史的角度而言,虔诚者路易重拾王国治理的信心,以至于其统治后期是以延续前期为基调的。^②

重估离不开对史料的重新阐释。1990年代,一系列史料编辑工作要么重新提上日程,如虔诚者路易的赠地文书;要么编辑新版本,如1995年,恩斯特·特伦普(Ernst Tremp)重新编订了瑟甘的《路易皇帝传》和无名星官的《路易皇帝传》。1996年,格尔哈尔德·史密茨(Gerhard Schmitz)编订了安瑟吉斯(Ansegis)的《条令汇编》(*Collectio capitularium Ansegisi*),为学者了解虔诚者路易统一法令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史料基础。1997年法国学者菲利普·德普约(Philippe Depreux)出版了虔诚者路易近臣的集体人物传记词典。在重估查理曼、重释帝国解体和反思法德国家起源研究的学术大潮之下,德普约将虔诚者路易牢固地安置于一个广泛的教俗贵族群体之中,不仅有利于摒弃“他的儿子们贴在这位谦卑君王身上的消极偏见”,也有助于调查其治理的细节。^③

2008年至2011年,为了进一步夯实牛津大学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以柏林自由大学的斯蒂芬·艾斯德斯(Stefan Esders)为首席专家、一个国际学术团队向法国国家研究基金和德国研究协会共同申请了为期3年的大型课题“危机的创造力:虔诚者路易的统治(814-840年在位)及加洛林帝国的转型”。项目召集了3次国际学术会议,“围绕重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交换新视野和新观点”。^④他们的具体工作则是重新编辑一些重要的政治文献并提供详细的评注和德法译文。2013年,彼得·埃尔哈尔特(Peter Erhart)、卡尔·海德科尔(Karl Heidecker)与伯安哈尔德·策勒尔(Bernhard Zeller)一道重新编辑了虔诚者路易统治时

期圣高尔修道院的赠地文书。2016年,3大卷虔诚者路易的赠地文书集由伯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著名史家科尔策(Theo Kolzer)领衔编辑出版。这一史料集不仅填补了虔诚者路易研究的最大史料缺憾,而且也标志着有关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原始史料基本上都有了新的精校精注本。

对路易之功过入品的重估推动史料重编,而重编后的史料反过来推进对虔诚者路易的新理解。法国学者伊萨雅(Isaia)敏锐地指出:“(虔诚者路易时期留下的)丰富多元史料为史家提供的是机遇:虔诚者路易的形象可以比查理曼更加细腻。”^⑤通过重新解释文献,史家注意到,王国政治危机会激发政治文化的创造力,通过克服危机创造新的概念、尝试新的道路、拓展政治多元化发展的新方向。多元化发展的背后,则是“共识政治”或者“政治共识”机制。

共识政治本是形容“二战”后英国政党政治的术语。朝野两大党政见差异日益缩小,在大政方针上形成了共识。20世纪末,英国学者珍妮特·尼尔森、提默西·罗伊特(Timothy Reuter)和斯图亚特·埃尔利(Stuart Airlie)分别研究加洛林法庭、王国大会和军队集会,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加洛林共识政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在加洛林政治体制研究中,缺乏系统的中央官僚制度被视为加洛林中央政治的硬伤,也被视为帝国分裂的制度原因。然而,加洛林共识政治提供了一种软制度建设,使具有广泛生命力的协商性政治得以实现。加洛林政治如何通过协商实现中央政令的有效下达,地方诉求如何及时地反馈到中央,中央、巡察钦差和基层频繁互动,建构起强大持久的加洛林政治共识,深远地影响到了后加洛林乃至整个中世纪政治。^⑥而虔诚者路易一朝则是王国集会制度最为流行且制度化最为深入之时。^⑦虔诚者路易所依赖的那套政治机制可能跟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在形式上不那么相似,却适应了当时地方政治复杂多元的现实。不仅如此,这套不那么中央集权化,不那么官僚化的政治制度,也起到了维持王朝治理稳定性的作用,如尼尔森在评价查理曼去世时所做的经典性概括:“不变的是制度。”^⑧它不仅维系着

王朝的稳定,而且还带有非常深刻的普世性政治思想元素,有利于加洛林君臣齐心协力,去实践能使帝国人民得到普遍救赎的基督教理想政治。

除了制度史的更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也得到了崭新的评估。2009年,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教授麦克·德容(Mayke de Jong)发表专著《忏悔性政府》(*The Penitential State: Authority and Atonement in the Age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英国年轻学者库特勒·布克尔(Courtney M. Bookler)发表《过去的罪证:虔诚者路易的忏悔和加洛林王室的衰落》(*Past Convictions: The Penance of Louis the Piou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olingians*)。这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文化与史学叙事的角度共同将重估虔诚者路易的学术活动推向高潮。德容从基督教社会与政治话语的角度揭示了加洛林基督教共识政治的游戏规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虔诚者路易以身作则,通过举行公开忏悔占据了道德高地,训诫王国臣民,实现基督教神圣政治。她不仅将822年的阿提涅忏悔视为一种政治成功,而且也对其晚年的统治做了积极的评价。用她的话来说,加洛林帝国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衰落。^⑩而布克尔则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分析了9世纪历史叙事中的衰落话语,认为有关衰落的话语不可一概而论,人们往往是在利用衰落来说事,以戏剧化场景来增加说服力。为此,需要逐一地细致分析特定的衰落话语。^⑪

为虔诚者路易翻案的学术成果在2011年出版的英文教材《加洛林世界》(*The Carolingian World*)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在论述内战爆发原因的时候,作者对传统解释进行了批评:“传统解释将路易视为宫廷派系斗争的被动角色,一派以皇后朱迪斯为首,试图为了秃头查理而重分帝国;另一派支持罗退尔和《帝国御秩》的不可更改性。这一观点的难点在于过分依赖于为了证明皇后和叛乱者合法的宣传性资料。”^⑫相反,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太过于成功,他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派遣的巡察钦差肆意行使权威,帮助皇帝积极干预司法,尤其追究阿奎丹王丕平党羽的罪责之时过于严厉;而且还创造了一套关注伦理和公正治理的、系统而行之有效的基督教政治改革话

语。当路易大肆追究官员责任之时,贵族们和法兰克人民也自觉地运用这一套话语来自我保卫并苛责虔诚者路易,要求他对军事失败、天降灾异等负责并悔改,从而引发了内战。尽管如此,由于制度的延续性,834年复位的虔诚者路易仍然有效地统治着帝国。^⑬虔诚者路易的虔诚似乎不再意味着软弱,而是代表了有理想的谦卑基督教君王典范;史家读出了文献背后那个具有权威感的、意图有所作为的基督教皇帝。

三、虔诚与正义:对重估的重估

70多年来,以冈绍夫和珍妮特·尼尔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从政治制度的角度重评虔诚者路易,将政治人物的活动置于以共识政治为特点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中,不以虔诚者路易个人的政治成败论其所继承并加以发展的政治制度,强调制度建设的成功及其良好运作,加洛林帝国并没有因为虔诚者路易晚年的内乱而衰败。^⑭政治制度之外有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加持,教会与宗教又回到加洛林政治与社会之中,重估意味着从基督教神圣政治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虔诚者所谓为何。

通过重估虔诚者路易,学者矫正了现代教俗分离视野下的某些学术偏见,将教会作为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政治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分析当时人尤其是统治集团如何构建独特的基督教政治话语、建设基督教社会政治共同体。通过重估,历史学家不仅为虔诚者路易成功翻案,而且也从新的角度界定了加洛林政治。^⑮

重估虔诚者路易和加洛林政治不仅促使学者去重新解读加洛林王室留下的资料,而且增加了自下而上的视角。地方史的研究,通过对地方政治的揭示,更好地将加洛林王室政治置于地方政治的运作之中,王室与地方贵族之间的政治互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揭示。英国学者茱莉亚·斯密斯(Julia Smith)的《行省与帝国:布列塔尼与加洛林王室》(*Province and Empire: Brittany and the Carolingians*)开导先河。她明确地以“殖民者与边缘地区”的双重视角研究布列塔尼地区。^⑯在她之后,仅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古生活与思想”系列之四就出版了诸多的地

方史佳作。如1995年出版了帕特里奇亚·斯金纳(Patricia Skinner)的《南意大利的族权:850-1139年间的盖塔公爵领及其邻居们》(*Family Power in Southern Italy: The Duchy of Gaeta and its Neighbours, 850-1139*)等。地方史的作品为重估虔诚者路易设置了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政治交流框架,尤其为内战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丰富的舞台。

重估虔诚者路易的方法也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回到文本,从而回到史料,从新的角度进行文本解读,提炼出相应的话语,进而分析这些话语所构建的文化。正是由于回到史料和文本,基督教话语的色彩格外浓烈,因为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的主要文献基本上都是由教会人士所书写。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者似乎重新站在教会之窗前来观察虔诚者路易的统治及其政治。虔诚者路易不再软弱,也没有忽视帝国的利益。

然而政治话语具有相当的理想性质,会脱离政治实际,乃至遮蔽历史的真相。美国学者安德鲁·罗密西(Andrew Romig)从君王镜鉴体裁的角度,重新解读无名星官对虔诚者路易的批评:虔诚者路易近乎完人,美中不足的是他“过于仁慈”。罗密西认为,古典司法正义与宽恕之间的张力被中世纪基督教会消解,虔诚者路易时期强调通过宽恕达成正义。惟有不讲原则的仁慈方能在内战之中获得和平,作为拥有至高权力的皇帝,为了获得和平,虔诚者路易不惮于宽恕其对手。无名星官的论断是寓贬于褒。^⑩

这一新的评价颇有点矫枉过正。重估虔诚者路易的重要代表托马斯·诺贝尔也认为,无名星官承认虔诚者路易的唯一缺点,使虔诚者路易呈现超人形象的同时也具有普通人的色彩。^⑪确实,在无名星官的《皇帝路易传》中,“过分”与其说是贬义词,毋宁为中性词,可以修饰褒义或贬义词。可能从道德的角度,过分仁慈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性格优点,然而如果回到话语背景之中,内战正反阵营似乎都指责过虔诚者路易的过分仁慈。瑟甘的《路易皇帝传》说,虔诚者路易耳朵根子太软,容易听信坏人的建议。833年,对手们也在指责虔诚者路易不以办错事为

耻,反以能忏悔为荣。^⑫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表明虔诚者路易的过于仁慈颇有点是非不分。

对于路易之过分仁慈和听坏人的建议之指责,也意味着虔诚者路易的一些决策缺乏公正,甚至过分放任自己的权力意志。过分仁慈指向了他的家长制作风,虔诚者路易随意处置家族成员的继承权。例如817年,他跟一小撮人商议之后,颁布《帝国御秩》,立罗退尔为共治皇帝,强推确保兄长权威的帝国传承模式;而在830年,他一意孤行,破坏了自己和大家宣誓效忠的《帝国御秩》,废除了罗退尔的共治皇帝称号;831年再次分国之际,虔诚者路易明确宣布,自己拥有改变继承份额的权利。^⑬838年,阿奎丹的丕平去世之后,他也不顾及其生前的诉求,剥夺了孙子丕平二世(Pippin of Aquitaine II,约823-864年在位)的继承权;再如839年,他将帝国在罗退尔和秃头查理之间均分,完全忽视了日耳曼路易的正当继承份额诉求。^⑭

四、结语

家族政治同时包含家庭与政治双重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前现代政治的核心挑战之一。虔诚者路易刻意彰显父权,将继承权与服从父权简单地挂钩,为此不惜随意改变帝国传承方案,触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帝国陷入公开的内战之中。^⑮虽然如学术重估所证明的那样,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意味着加洛林帝国的衰落,危机引发政治创造力,加洛林政治从一元向多元政治模式转化;但是虔诚者路易的晚年确实开启了某种历史转折,将虔诚者路易的统治时期一分为二的理念依然有效。

加洛林君臣推崇虔诚,然而虔诚的具体社会与政治含意却言人人殊。本文开篇提到了日耳曼路易要在晚年“重估”父亲的虔诚,借此儿子与父亲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虔诚”的隔世对话。大约10年之后,这场竞赛似乎以各有所得而暂时告终。圣高尔修道院(St. Gallen)的修士结巴诺特克分别提到了这对父子的绰号:“有必要提到您最光荣的被称作‘光辉者’的父亲路易、您最诚笃的被称作‘虔诚者’的祖父路易。”^⑯日耳曼路易被构建为声名赫赫的王者形

象,而虔诚者路易则以宗教虔敬为优。7世纪的圣徒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在其流传甚广的《辞源》(*Etymologiarum libri XX*)中指出,王者的美德主要“有二;正义和虔诚。对于王者而言,虔诚之德更值得赞美;因为王者当不言而喻的正义”。^④他又说,凡是正义的王者都虔诚,然而并非所有虔诚的王者皆具有正义的美德。

揆之以这种政治话语背景,虔诚者路易的政治实践功败垂成,如何协调虔诚与正义,仍有待于加洛林政治的继续探索。虔诚者路易所经受的政治曲折又以续弦、生子、边疆危机等为导火索,如何从情感、性别、家庭、边疆等多角度重估虔诚者路易,尚有待于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分析。

注释:

① G. H. Pertz & F. Kurze eds., *Annales Fuldenses sive Annales regni Francorum orientalis,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891, a. 874, p. 82.

② E. Tremp ed., *Astronomus: Vi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995, Vol. 63, p. 550.

③ R. Schieffer, "Ludwig 'der Fromme' Zur Entstehung eines karolingischen Herrscherbeinamens", in *Frühmittelalterliche Studien*, ed. by K. Hauc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2, Vol. 16, pp. 58-73.

④ Nikolaus Staubach, "Des großen Kaisers kleiner Sohn': Zum Bild Ludwigs des Frommen in der älteren deutschen Geschichtsforschung", in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ed. by P. Godman & R. Colli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701-722.

⑤ Heike Nelsen-Minkenberg, *David oder Salomon? Studien zur Rezeptionsgeschichte Kaiser Ludwigs des Frommen in der Historiographie des 9. bis 13. Jahrhundert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RWTH Aachen University, https://www.academia.edu/1047196/David_oder_Salomon_Studien_zur_Rezeptionsgeschichte_Kaiser_Ludwigs_des_Frommen_in_der_Historiographie_des_9_bis_13_Jahrhunderts. 最近浏览日期:2024年8月8日。

⑥ T. F. X. Noble, "Louis the Pious and his piety re-considered,"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tome 58, fasc. 2(1980), pp. 297-316.

⑦ "No. 259. Capitulare missorum Suessionense, 853. April. 22-26", in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ed. by A. Boretius & V. Krause, MGH., *Leges, Capit.*, Vol. II, p. 268.

⑧ [法兰克]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5页。

⑨ 王晋新:《论“天文学家”所著〈皇帝路易传〉》,《西学研究》(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115—162页。

⑩ F. Kurze ed., *Reginonis abbatis Prumiensis Chronicon cum continuatione Treverensi*, 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890, p. 73.

⑪ C. West, "Knowledge of the past and the judgement of history in tenth-century Trier. Regino of Prüm and the lost manuscript of Bishop Adventius of Metz", *Early Medieval Europe*, Vol. 24, No. 2(2016), pp. 137-159.

⑫ "43. Rom, Ende April-Anfang Mai 1059", in *Die Konzilien Deutschlands und Reichsitaliens: 1002-1059*, ed. by D. Jasper, MGH., *Concilia aevi Saxonici et Salici MXXIII-MLIX*, Vol. 8, Hannover. Hahn, 2010, p. 397. 李振宇:《教宗权威与规范化的宗教生活:11世纪西欧教会改革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12页。

⑬ A. Hofmeister ed., *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 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912, lib. V. p. 259.

⑭ J. Viard ed., *Les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7, Vol. iv, p. 103.

⑮ Henrici Spondani *Mauleosolensis Epistomes Annalium ecclesiasticorum Caesaris Baronii, pars altera*, Lyon: Sumptib. Ioannis Antonii Huguetan, & Marci Antonii Ravaud, 1660, pp. 246-26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史学,以书名使用历史三分法而知名的克拉利乌斯(Cellarius)的《世界史:古代、中古和近代》对虔诚者路易的论述极少,仅仅半页纸不到,提及了三件政治事件,镇压意大利王伯纳德的叛乱、战胜周边蛮族,以及诸子叛乱。C. Cellarius, *Historia universalis breviter ac perspicue exposita antiquam et medii aevi ac novam divisa cum notis perpetuis*, Jena: Sumtu Io. Felicis Bielckii, 1716, 5th ed., pp. 98-99.

⑯ [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上册,第428、429、435页。

⑰ [法]孟德斯鸠著,彭盛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312—315页。

⑱ M. Michelet, *History of France*, Vol. I, book II, trans. by

G. H. Smith, New York: D. Appleton & Company, 1845, pp. 126-131.

⑲ R. Poupardin, "Louis the Pious", in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II, Germany and The Western Empire, ed. by H. M. Gwatkin et a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 13.

⑳ P. Godman & R. Collins eds.,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p. vii.

㉑ F. Ganshof, "Louis the Pious Reconsidered," *History*, Vol. 42, No. 146(1957), pp. 171-180.

㉒ T. F. X. Noble, "Louis the Pious and his piety re-reconsidered," pp. 297-316.

㉓ J. Nelson, "The Last Years of Louis the Pious", in *Charlemagne's Hei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ed. by P. Godman & R. Collins, pp. 147-160.

㉔ P. Depreux, *Prosopographie de L' entourage de Louis le Pieux (781-840)*,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7, p. 1.

㉕ M. Gravel & S. Kaschke eds., *Politische Kultur und Textproduktion unter Ludwig dem Frommen*, Ostfildern: Jan Thorbecke Verlag, 2019, p. 7.

㉖ M. - C. Isaïa, *Histoire des Carolingiens: VIII - X siècle*, Paris: Editions Points, 2014, p. 204.

㉗ [英]蒂莫西·路透著, 张建辉译:《8—12世纪西欧的集会政治》,《英国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1—88页;朱君杓:《〈库莱纳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世界历史》,2023年3期。S. Airlie, "Talking Heads: Assemblies in Early Medieval Germany," in *Political Assemblies in the Earlier Middle Ages*, ed. by P. S. Barnwell and M. Mostert, Turnhout: Brepols, 2003, pp. 29-46。J. Nelson, "How Carolingians Created Consensus," in *Le Monde carolingien: Bilan, perspectives, champs de recherches*, ed. by W. Fałkowski et Y. Sassier, Turnhout: Brepols, 2009, pp. 67-82.

㉘ D. Eichler, *Fränkische Reichsversammlungen unter Ludwig dem Frommen*, Hannover: Hahn, 2007.

㉙ J. Nelson, "How Carolingians Created Consensus," p. 80.

㉚ M. de Jong, *The Penitential State: Authority and Atonement in the Age of Louis the Pious, 814-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有关加洛林训诫话语的精彩研究, 参见刘寅:《“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17年1期。

㉛ C. M. Bookler, *Past Convictions: The Penance of Louis the Piou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olingia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㉜ M. Costambeys, Matthew Innes, Simon Maclea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3-222.

㉝ M. Costambeys, Matthew Innes, Simon Maclean, *The Carolingian World*, pp. 213-222.

㉞ J. Nelson, "The Last Years of Louis the Pious," in *Charlemagne's Heir*, ed. by P. Godman & R. Collins, pp. 147-160.

㉟ M. de Jong, "The Empire that was always Decaying: The Carolingians (800-888)," *Medieval Worlds*, Vol. 2(2015), pp. 6-25.

㊱ J. M. H. Smith, *Province and Empire: Brittany and the Caroling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

㊲ A. J. Romig, "In Praise of Too-clemented Emperor: The Problem of Forgiveness in the Astronomer's 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s," *Speculum*, Vol. 89, No. 2(Apr. 2014), pp. 382-409.

㊳ T. Noble,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Lives by Einhard, Notker, Ermoldus, Thegan and The Astronomer*,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4.

㊴ “由于他自己不名誉地彻底背弃自己的誓言, 他后来甚至下令让它成为自己神圣虔诚的符号。”"No. 197. *Episcoporum de poenitentia, quam Hludovicus imperator professus est, relatio compendiensis*, 833. Oct.", in *Capitulariaregum Francorum*, Vol. II., ed., by A. Boretius & V. Krause, MGH., Legum section II., Capit., Hannover: Hahn, 1897, pp. 54.

㊵ 李隆国译:《〈831年分国诏书〉之第13款》,《西学研究》(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1页。

㊶ 有关加洛林分国与继承的系统研究, 参见李云飞:《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历史研究》,2021年2期。冯加帅:《分国与加洛林家族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㊷ 相关中文讨论参见朱君杓:《奥尔良主教约纳斯〈王者之规〉中的孝父劝诫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舆论战》,《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4年3期。

㊸ 圣高尔修道院僧侣著, 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第95页。

㊹ W. M. Lindsay ed., *Isidori Hispalensis episoc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um libri XX, lib. IX, iii,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